

## 似水流年

## 当村支书一年间

## 朝花夕拾

## 自己去住院

1974年,唐山市玉田县林头屯公社领导决定,让我这个公社民办教师回我村(后户部庄)任党支部书记。

那年我34岁。我想,公社党委这样信任我、重用我,我一定不辜负党委的重托,把家乡建设好,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。

我是1974年2月回村的。我们村西边有西山,东边有一条大河,地理环境好,但是大队跟村民都没钱,村里连电都不通。

当时正在修建京唐铁路,我托一位熟人帮忙联系,看看工地上有什么我们能干的活儿。得到的消息是,正缺少铺路的石渣,需要大量收购。俗话说: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。我马上发动村民到西山上采石头,砸成修铁路用的石渣。考虑到村里没有通电,我就把砸石渣跟通电联系在一起,规定每家砸1立方石渣,

大队给办1个电灯灯头。砸多少立方石渣安多少个灯头,多余出来的每立方给5元钱。

政策一出,一时间,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,很快就把两座小山似的石渣砸出来了,京唐铁路修建方用马车源源不断地拉走石渣。砸出的石渣全部拉清后,大队有钱了,马上就把电接进村里,给各家各户安好电灯。从此,村里告别了点煤油灯的时代,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。

接下来,我四处找熟人、托关系,看看有什么活儿可干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得知唐山机械厂需要临时工,包吃住还给工资。我马上跟工厂联系好,在村里挑选了16名年轻小伙子去上班。工厂每人每天给5元钱,大队决定个人留1元,上交大队4元,作为集体收入。我又联系天津、潍坊两地,输出泥水匠

10人,每人一天补助10元,个人留2元,8元上交大队。听到消息后,村民们争先恐后地报名外出务工。

我刚回村里时,村里田地亩产粮食不过三四百斤,皮棉产量也不高,社员分日值两三角钱,大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经过测算,我在村里定了个指标,要在年底实现“三个8”:亩产粮食达到800斤、亩产皮棉达到80斤、工分日值8角钱,并写成标语,悬挂在村里的主要街道、路口,让全村人的心中都有奋斗目标。

“五一”快到了,村东头水库里的水因为浇麦田快用完了,水库里的野生鱼不少。此时正值农历四月庙会,也是我们当地的重要节日,大队手里有了些钱,也该让村民改善一下生活了。我便和两个队长商议,

决定把水库抽干,把鱼捞起来分给各户,生产队再杀4头猪,每人1斤肉1斤鱼,过个欢乐喜庆的节日。领到过节的肉和鱼,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在背后夸我是个好书记。

日子有奔头了,大家的干劲儿更足了。到了年底,村里真的实现了“三个8”。那时,能实现8毛钱的工分日值十分罕见,年底有的户分到600多元钱,我家劳动力少,还分了180多元。小麦亩产量达到800斤后,村里人均分了180斤小麦当口粮,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皮棉也实现了亩产80斤。

我们村的经济效益在全公社24个大队里一跃排名第二,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。

第二年,因为工作需要,我又被调回公社,开始了新的征程。

黄自兆/文

1966年,我11岁,还在农村生活,家里很穷。

那年秋季的一天,父母去走亲戚没在家,我突然感到乏力、恶心、脖子僵硬。想起老师讲过脑炎的症状,便对奶奶说:“我好像得脑炎了,得去医院。”奶奶说:“你爹你娘明儿就回来了,明儿去不中?”我说:“不中。”

医院就在我村村南,离我家有2里远,我就自己去了。以前我曾在医院附近玩儿,听大人们说过,这里最好的医生叫老孟,也认得他。我到医院后,恰好在院里遇到孟医生,我说:“孟医生,我可能得了脑炎,你给我看看吧。”他当即把我领到屋里,检查了一下,然后告诉一个女医生:“他得的是脑炎,叫他住院吧。”

就这样,我住进了医院。

第二天,父母走亲戚回来后,匆匆忙忙赶到医院,我的病已经好多了。

我在医院住了几天已经记不清了,但一共花了11块钱,却记得很清。因为父亲说过一句话:“这钱准备买辆旧车子,也买不成了。”

贺玉海/口述 陈剑/整理

**编辑提醒:**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

## 记忆深处

我和奶奶都属牛,她比我大整整四轮。在我的记忆深处,奶奶勤劳又善良,她是一位慈祥的长者,也是我的人生老师。

我小时候,爷爷以干农活为主,奶奶则忙于家务活,但到了农忙时,奶奶照样下地割麦子、打场、掰玉米、搬白菜等,哪一样也少不了奶奶。

农闲时,奶奶白天在甯子里织布,晚上在煤油灯下纺线或纳鞋底。常常是我睡醒一觉

后,见奶奶仍盘腿坐在炕头上,一手摇着纺车把,一手捏着棉花絮子,纺车不停地转,她的双手机械般重复着同一动作。纳鞋底时经常看到她把针往脑门上扎,然后再扎向那厚厚的千层底。这些活只能在晚上做,因为白天还要缝洗衣服、磨面、收拾家务、做全家人的三顿饭,以及喂猪、喂鸡,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。

奶奶心地善良,对父亲及

## 怀念奶奶

两个姑姑都很疼爱,从未见她对子女红过脸或发脾气。奶奶对我们晚辈也格外呵护,我们兄妹中谁身体不适了,她要么给揉揉肚子、捏捏头,要么就是沏上一碗姜糖水,让我们盖上被子捂出汗来。就连对要饭的,奶奶都会或多或少给点儿吃的。有一天家里炸饅子,恰巧来了一个要饭的,奶奶毫不犹豫地给了人家一根,要知道那时一年也吃不上一

次炸饅子。

1960年经济困难时,奶奶为了让全家人吃饱,几次到村外去拾平时喂牲口的野高粱。一次,她因为疲劳加饥饿而迷了路,家就近在咫尺却找不到了。

奶奶不识字,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但她非常重视教育,把父亲和姑姑都培养成了大学生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,这是极为罕见的。

狄民建/文

## 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
我们的价值观
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

天津人郑霞绘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

## 图说往事

## 到省城参加培训



1982年,根据上级安排,我到石家庄河北建设学院参加培训。这是由省委组织部举办的中青年干部培

训班,时间为1年,共有54名学员。来自邢台、邯郸的学员为一组,有11人,指定我为组长。在那里,我们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、哲学、科学社会主义和农业经济等方面的理论知识。1983年暑假,培训班结业。结业前,我们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参观学习,受到一次革命传统教育。

图为我们培训班老师和学生的合影,后排右三为本文作者。

贾培兴/文并供图

## 开错处方

一位老友问我,嗓子疼吃什么药,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:“六神丸,一次10粒,一日3次。”

说起我对六神丸的应用史,我这个自认为中西医两条腿走路的老医生,还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哩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被选派参加了“河北省西医学习中医班”,在省城的一所中医门诊部,跟随一名老中医临床学习。这位老中医对我很赏识,临床看病对我也很放手。

一位咽喉肿痛的患者就诊,老师说给他开点六神丸,因急着出去办事,就给我留下一张签好字的空白处方纸,让我开方子。病人拿着我写好的药方出门取药,约莫半个来钟头,病人又拿着处方回来了,说:“医生,药房说您开的处方药量不对,给退回来了。”我

接过处方一看,吓了一跳,纸上赫然写着:“六神丸二两,口服一钱,一日三次。”我咋开了这么大的量呢?我正在不知所措时,老中医回来了,看了看方子,微微一笑,说:“这是我的错,没把好关。”老中医和颜悦色地教导我:“六神丸含蟾酥,吃多了会伤人,六神丸只有米粒大小,一次10粒,只能数粒吃,不能上秤称,你好好看看书吧。”

我痛恨自己没有学好药味和药量,工作马虎,闹出了差错,幸亏药房把关严格,否则病人真的吃出病来,可就麻烦了。

从此,六神丸的正确使用方法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我以“笃学、严谨、无差错”为座右铭,常年坚持,终身受益。

康昌清/文